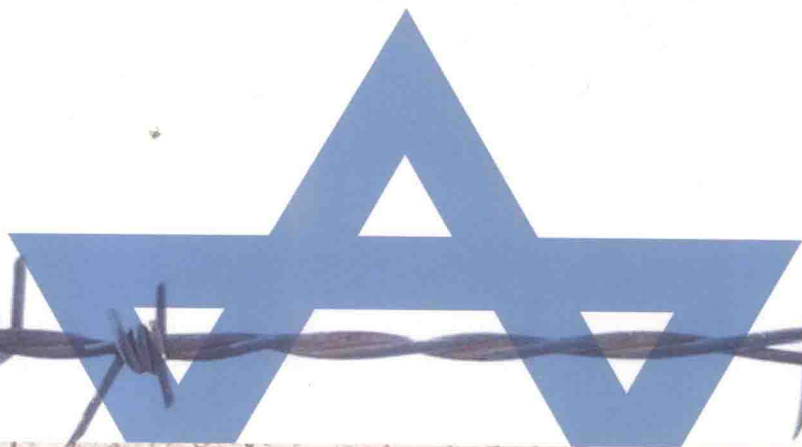


THE IDEA OF ISRAEL  
A History of Power and Knowledge

【以色列】依兰·帕普 著  
张金凤 译

# 以色列理念

权力与知识的历史



本书是一部  
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历史  
进行全新解读的译著  
是著名以色列史学家依兰·帕普撰写的力作

解放军出版社

THE IDEA OF ISRAEL  
A History of Power and Knowledge

# 以色列理念

**权力与知识的历史**

【以色列】依兰·帕普 著

张金凤 译

解放军出版社

图字：军 -2015 -26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以色列理念 / [以色列] 依兰·帕普 (Ilan Pappé) 著；  
张金凤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 2

书名原文：The Idea of Israel

ISBN 978 - 7 - 5065 - 7152 - 4

I. ①以… II. ①帕…②张… III. ①以色列 - 历史 - 研究  
IV. ①K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8752 号

本书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经由中华版权代理中心授予

First published by Verso 2014 @Ilan Pappé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1 3 5 7 9 10 8 6 4 2

Verso is the imprint of New Left Books

ISBN -13: 978 -1 -84467 -856 -3

eISBN: 978 -1 -78168 -247 -0 (US)

eISBN: 978 -1 -78168 -545 -7 (UK)

书 名：以色列理念

---

作 者：[以色列] 依兰·帕普

译 者：张金凤

责任编辑：闫永春

责任校对：刘晓京

装帧设计：李 戎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010 - 66531659 (发行) 66737333 (编辑)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16

字 数：300 千

印 张：21

版 次：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65 - 7152 - 4

定 价：4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目 录

前言 有关以色列理念之辩论 ■ 1

## 第一部分 学术和虚构作品中的以色列理念 ■ 15

第一章 巴勒斯坦地区及其居民的“客观”历史 ■ 17

第二章 变成恐怖分子的外来者：复国主义者眼中的  
巴勒斯坦人 ■ 29

第三章 1948 年战争：历史与形象 ■ 53

## 第二部分 以色列的后复国主义时期 ■ 73

第四章 开拓者们 ■ 75

第五章 认识巴勒斯坦灾难：重新审视 1948 年战争 ■ 115

第六章 后复国主义学术环境的出现，1990—2000 ■ 137

第七章 触碰社会的敏感神经：以色列的大屠杀记忆 165

第八章 以色列理念与阿拉伯犹太人 193

第九章 后复国主义文化运动 213

第十章 后复国主义的舞台和银幕 233

第十一章 新复国主义的胜利 263

第十二章 新复国主义的新历史学家 291

后记 以色列形象 2013 313

## 前言 有关以色列理念之辩论

如果冷静客观地进行全面考虑,我们就会明白,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实现了其大多数目标。考虑到这一运动起始阶段所面临的独特困难(这使它成为当时最脆弱的政治运动),也许可以说,它实现的目标比当代其他任何运动都要多。正因为如此,犹太复古主义运动足以成为现代政治运动的成功典范。<sup>①</sup>

——约瑟夫·格尼

在现代科学发现、古代文献与考古学发现的共同影响之下,巴勒斯坦地理变成了希伯来人故乡的地理,对这块土地上的文化研究则变成了对希伯来文化的研究。<sup>②</sup>

——约瑟夫·巴斯列夫斯基

1994年7月的一个炎热的晚上,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个大厅里,前来聆听一场有关以色列知识与权力的演讲。听众之多令组织方倍感意外,他们原本计划的是一场小型的纯学术讨论,还专门选择在美国世界杯的半决赛期间组织了此次讨论。他们本来希望参

---

① 约瑟夫·格尼,《对犹太复国主义这一乌托邦意识形态的思考》,《现代犹太主义》,18:3,1998年10月,第241页。

② 约瑟夫·巴斯列夫斯基,《你了解这块土地吗?——加利利与北部谷地》,选自艾因的《以色列:合作农场》(希伯来语),A卷,1940年,第xi页。

与会者仅限于少数愿意放弃精彩的世界杯之夜而来聆听学者讨论的怪人,可是,有那么多的学生拥入这个并不大的厅里,组织者不得不将演讲地点临时更换到一个更宽敞的大厅。根据一份对当时情境的描述,有好几百人聆听了这次辩论,辩论双方分别是以色列的一“老”、一“新”两个历史学家,一个已经“功成名就”,另一个则是“修正主义者”,我就是当时的这个“新”历史学家。

和之前的宣传不同,这次辩论其实并不是一场对话,而是由四个演讲构成,间或发生一点怒气冲冲的小争论。不过,和地球另一边为世界杯半决赛加油喝彩的观众一样,辩论的观众们似乎也非常享受其过程。<sup>①</sup>

当时辩论双方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以色列学术界是否已经沦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工具?它还是自由思想与自由言论的堡垒吗?参与辩论的绝大多数听众都倾向于前一种看法,他们都怀疑以色列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如果能够通过听众的掌声大小判断他们是否赞成某观点,那么,他们大多数人都支持我和我的同事施洛莫夫·斯威尔斯基,新以色列历史与社会学的代言人,而不太支持老派的安妮塔·夏皮拉和已经去世的莫舍·里萨克。不过,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再向前走一步。<sup>②</sup>有些人,和我一样,由于不能改变现状,最终还是怀着绝望离开了以色列这个国家。<sup>③</sup>不管如何,那次事件发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即,当时的以色列人开始怀疑以色列理念的合理性,并且在短时间内可以对此理念提出质疑,无论是在大学象牙塔的内部还是外部。

---

① 请见1994年7月13日《国土报》。

② 某日报这样描述这次辩论:“依兰·帕普宣称,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殖民主义。他说,在以色列,这两者已经可以画等号,因为相信这一观点的人都获得了大学的终身教职。”这份报道继续说,由此,以色列出现了理论性很强的辩论。“听起来很无趣,是吗?600多人拥入了大学讲堂,他们宁愿放弃世界杯上保加利亚淘汰了德国的那场比赛。”兹维·吉拉特,《新消息报》,1994年7月13日。

③ 本人的著作《跳出框框:争取学术自由》中描述过这一点。伦敦:普路透出版社,2010年。

那天晚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来自莫舍·里萨克,他是以色列传统社会学界的前辈,曾经获得过颇具影响力的“以色列奖”。他说:“我同意存在两种叙事的说法,不过,我们的叙事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他的这句话,以及我对那天晚上和那整个时代(权力与知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的记忆,促使我开始写作此书。此书主要探讨以色列这一理念,它汇聚了许多试图从内部质疑这一理念但却短暂而无果的努力。

任何一部有关以色列的书其实都在试图解析一个复杂而模棱两可的现实。可是,无论人们如何描述、分析与呈现当代以色列,其结果总是主观而有限的。不过,结果的主观性与相对性却并不会弱化这种探讨本身的道德与伦理意义。实际上,从我们这个时代(21世纪早期)来看,这些讨论在道德与伦理层面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有关实质、事实和证据方面的讨论。和在特拉维夫的那场辩论一样,在以色列,存在诸多版本不同、互相矛盾的现实,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极少。

但是,我必须强调,这些版本不仅仅有关学术探讨,而且有关生与死的较量,因此,任何希望以中立、客观、纯科学的角度进行对话的努力,都注定以失败告终。以色列,或者更具体地说,以色列理念,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意味着压迫、剥夺、殖民化与种族清洗,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越来越少的人将这些理念与事件看作是一个充满救赎、英雄主义和历史正义的故事。在这两个极端看法之间,存在许许多多不同但是同样强烈的观点。

在本书中,我将力图表明,这些互相对立的版本其实并非有关以色列本身,而是有关以色列的理念。很明显,以色列并非仅仅是一个理念,它首先是一个国家,已经存在了60多年的政治实体。拒绝承认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不过,从伦理、道德和政治的层面对其进行评价,不仅可行,而且从现在来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真的,许多人觉得,以色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道德性令人生疑(甚至是非法)的几个国家之一。怀着各式各样信念和决心的人们所挑战的,并不是这个国家本身,而是有关这个国家的理念。有些人可能会



说,他们挑战的是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ideology),同时,另一些以色列犹太人会说,他们是在为以色列的**理想**(ideal)而奋斗。我觉得,审视双方论点的最佳术语,应该是“**理念**”这一词汇。

过去的复国主义领袖与活动家、现在的以色列犹太知识分子与学者所构想出的形象与叙事,都认为以色列不可避免地、成功地践行了欧洲的思想史。在西方启蒙叙事中,思想就是促变因子,它将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将人类带入文艺复兴,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帮助人类重返文明。根据弗兰西斯·福山的观点,如果没有伊斯兰激进分子、苏联集团里的民族运动以及南美洲那些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破坏这一进步与现代化的进程,这种思想的历史几乎就已经终结。<sup>①</sup>

以色列就是这样一个变化中的理念,挑战这一理念,就相当于质疑整个西方的叙事并非推进全人类发展与启蒙的驱动力。在约瑟夫·格尼的眼中(见前面引文),尽管面临诸多拒绝启蒙、试图阻止人类进步的反作用力,复国主义依然是成功实施的、为数不多(如果不是唯一的)的现代化工程。正因为如此,他没有像大多数复国主义学者那样,将其称作为一个理念,而是将其称作“乌托邦般的意识形态”,只不过这个乌托邦已经成为现实。简而言之,他将其看作成功实施的理念。<sup>②</sup>

不过,本书并不是主要分析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以色列理念,或者,为什么以色列犹太人及其支持者对于自己观点的道德性居然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他们将任何反对声音都立即冠以反犹太主义的称号。在本书中,我关心的是那些对自己国家的理念持批评或者怀疑的人们。对任何以色列犹太人来讲,怀疑以色列理念都构成严重的困境,这已经超越了对某届政府的某项政策的批评,而是意味着,自己受到此理念的实质的困扰。

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以色列犹太人大多是通过学术研究表达了自己

---

①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纽约:自由出版社,1992年。

② 格尼,《对犹太复国主义这一乌托邦意识形态的思考》。

的忧虑,但是,也有人通过电影、诗歌、小说或者造型艺术来加以表达。他们的疑虑是学术性的,虽然是由好议论时政的知识分子们表达了出来,却反映了来自各个阶层和领域的人们更加隐蔽的担心。这种学术怀疑的存在,加之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担忧,表明以色列理念依然不具有确定性,依然是适合道德对话和政治辩论的论题。

理念可以加以商品化并进行营销,以色列理念也不例外。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官方一直在这么做,并且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帮助到海外旅游的以色列人推销这一理念的主流版本。有一度,以色列游客在出境通过本-古里安机场时,就能领到这本小册子。至今,在互联网上还能找到这本小册子。<sup>①</sup>

为了进行营销,必须将这个理念包装成一个叙事,一个包含国家诞生及其存在理由的故事。这个国家诞生了,理想成为了现实,这个现实必须加以谨慎维持,小心呵护。成功的营销策略增强了这个理念的合法性:一个国家可以依赖其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而存在,而这个理念却需要学者们加以巩固,合法性不能仅仅通过财力或道德敲诈来获得,而是必须加以证实,证实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希望:通过其学术界精英们,以色列官方就是这样看待这个国家的合法化过程。

即使在以色列这样的国家里,即使在这个拥有现代化程度排世界第二的军队、外汇储备高达5000亿美元的国家里,观众也依然需要说服。对以色列理念进行营销和巩固的需要,不仅仅来自于外部的挑战,也来自于内部可能的怀疑。另外,这些怀疑还不仅仅是学术性或哲学性的,而是可能促发一些反对国家的行动,并与国家的“敌人”达成一致。最近发起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行动”就是反对以色列理念的道德怀疑转化为具体行动的例证。<sup>②</sup>

既然以色列官方称自己为“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其宪法和国家

---

① 这是以色列信息部2000年发起的“以色列面貌”运动的一部分。

② 奥马·巴格胡提,《抵制、撤资与制裁:全球争取巴勒斯坦人权利》,纽约:海马吉特出版社,2011年。

形式上也呈现出民主国家体制的表象,那么,这个国家需要以各种方式来推销自己理念的道德性和逻辑性。从其国内来看,它拥有将其教育引向那个目标的权力,尽管在 1990 年代,它对教育系统的控制有所减弱。相对而言,媒体和学术界至少在理论上是自由的,国家不能对其加以类似的控制。在国内推销以色列理念,媒体是必需的;而在国际上推销此理念,学术界是有用的。如果要掌控媒体和学术界,就可能会出现下面两种情况:第一,这些自由媒介不屈服于政府对这个理念的阐释,因而不能扮演政府分配给他们的角色;第二,或者出于真实的信念,或者出于错误的信念(以为自己通过客观分析得出了同样的阐释),他们顺从了国家的叙事。

当从内部挑战以色列这一**理念**时,就意味着可以把复国主义者的**理想**解读为一种意识形态,这一理念因而成为一个供人们分析评论的更加有形、更加可行的靶子。1990 年代,一群以色列人就做了这样的事情,我在这里称其为后复国主义运动。

这群挑战者聚焦于这个理念的起源,以便核实它现在的地位及政府对它的阐释。政治和社会的进程促发了这一研究,引导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们越过有关当前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的讨论,越过 1967 年之后被占领领土的命运,将探寻的目光投向更久远的过去。

他们的旅程匆忙开始,又骤然结束。后复国主义运动开始还不到十年,官方以及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就将其定性为危险的、自杀性的行动,将导致以色列丧失其在国际上的合法性和道德支持。后复国主义,这是大多数观察者和学生为其取的名字,可是,在其敌人的眼里,它却成了反犹主义的代名词。到 2000 年,作为一个运动,后复国主义失败了,几乎销声匿迹。

本书将再现并审视这一旅程:这些挑战者如何从复国主义的舒服地带出发,如何到达终点,又如何多次重返那个舒服地带。这主要是一次思想之旅,几十个知识分子、几个记者、许多艺术家参与其中,他们深入国家和私人档案馆,探寻历史,并且,他们平生第一次认真倾听那些自认为是复国主义受害者的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写书撰文,制作纪录

片和专题片,也创作诗歌和小说。他们共同的关注点就是历史,重新评价过去,以求理解现在。

每一个后复国主义者踏上这个旅程的原因并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受到身边变动不居的现实的驱动,自从1967年以来,这个现实在不断逼迫他们考虑自己国家过去和现在的行为,并提出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些人中的学者们是最后提出质疑的,他们最终在1990年代西方知识界一些新潮流的鼓励之下走上了这条道路,这时的西方,对民族主义、国家政策和霸权文化策略等提出质疑已经成为惯常的做法。多民族化、多元文化且持后现代观点的西方学者们向这些以色列的挑战者们展示:如何解构权力(即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对所谓科学客观的学术研究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那些人们最终认清了自己的角色,那就是,作为知识的生产者,他们亲身参与创造了令自己深感不安的现实,因此,他们逐渐开始挑战自己参与研究、学习和讲授的那个有关过去的霸权版本。

后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们不仅仅是观察者,而且亲身参与了此进程。因此,他们的挑战最为人们所瞩目,也更加有效。他们参与了全球性的批评实践,这鼓励他们对历史、社会学和以色列的国家意识形态抱有更加相对主义的观点。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发现后殖民主义理论是探索文化压迫并努力在以色列犹太人内部对抗这种文化压迫的有力工具;而有些人则更愿意将复国主义、以色列以及反抗它们二者的努力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殖民情境。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将占主流的复国主义观点看作是正义、民主的国家解放运动,因此,无论采取何种途径,他们都是怀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精神,不惜惹怒自己的同事、亲朋好友,甚至最终惹怒自己的国家。他们引发的这种愤怒将导致自己的灭亡。

1990年代,这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和剧作家选择关注复国主义运动以及之后建立的以色列国的受害人,选择去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或者是因为他们自己就从属于某个受迫害的群体,或者是因为他们决定离开自己生活的舒适地带,去关注那些被殖民、被占领和被压迫的人们。对他们而言,以色列理念已经明显地成为

众人心目中一个无所不能的文本,支配着人们的生与死。问题是,这个文本能够重新书写吗?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已经不仅仅是思想界茶余饭后空谈的话题,而是成了一个严肃的存在问题。

如前所述,在本书中,我将这样的挑战和质疑称为后复国主义运动。有些人可能更愿意将这个运动看作是反复国主义运动,还有些人将其看作是较为温和的复国主义运动。有些后复国主义者确实是反复国主义者。不过,无论这些挑战者在挑战的旅程中走了多远,他们都不过是在寻觅复国主义的替代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最终返回了复国主义者意识形态的温暖怀抱,也有少数几个人走得更远,成为更加坚定的反复国主义者。有些后复国主义者自始至终都反对这个称呼;还有些人虽然自称为后复国主义者,但别人并不这么看待他们。很明显,后复国主义这一定义并非固定不变的,也颇多争议,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定义,我们姑且继续使用这一称呼。

不过,有关他们挑战的对象,是不存在争议的,那就是,对于以色列理念的普遍的复国主义解读。在本书中,我将这一普遍的解读称之为经典复国主义,我们这些挑战者们则是后复国主义者,这种挑战所引起的反应则被称之为新复国主义。新复国主义者们旨在巩固经典复国主义,对以色列理念提供更加坚定、更加爱国的解读,使之在将来不再受到类似的挑战。

就这样,历史的钟摆从复国主义摇摆到后复国主义,又再摇摆回新复国主义。它还将继续摇摆下去。在政治地图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种摇摆。1993年之前,历届以色列政府,无论左派当政还是右派掌权,都持有经典复国主义观点。之后一段时间,至少到1995年拉宾遇刺,甚至可能到1999年,我们能够看到一种更加自由、更加倾向于后复国主义的探索。自那之后,直到今天,是新复国主义政策在大行其道。

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以色列理念的力量远大于其挑战者的力量,前者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于胁迫和恐吓,而是因为,以色列理念已经被人们接受为现实,从而获得了合法性。它通过各种看不见的方式获得了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力量,挑战者们就是试图揭露这些隐秘的方式。以色列

理念对人们的稳固掌控使它得到了以色列犹太人的普遍支持,无论是大街上的普通工人还是象牙塔里的教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一理念成为令人着迷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为了评价以色列的未来,也是为了我们在 21 世纪的现在、在这个看似民主的社会中更好地理解权力与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

## 本书的方法论与结构

从方法论来说,本书主要将以色列理念、对它的挑战和应对放置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进行分析。我是一位历史学家,所以,本书主要侧重这一理念的产生历史及人们对它的挑战历史。这个挑战主要发生在学术界,但是在其他领域也有所表现,尤其是在电影界和电视台,这一事实使得我可以将以色列理念既当作学术争论话题,又看作虚构的艺术创作产品。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别是微乎其微的。这两种对现实的表现产生了几乎同样的叙事,尽管从表面看这两种表现是完全对立的。这种表现的单一性充分证明此理念的深入人心。这个国家叙述自己的故事,并通过学术界、媒体和艺术作品来证明其合法性,当然,在同样的领域内,它也遭到了挑战。

学术界宣称追求客观,而电影制作允许想象与虚构,纪录片则位于这两者之间,但它们都在后复国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在许多后复国主义挑战者失去了斗志和信心之后的今天,许多纪录片制作人依然在公开地、勇敢地挑战着以色列理念。

当一个理念拥有了将你包含或排除在一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之内或之外的力量,当它能够决定你是国家的朋友还是敌人,当它既被视为学术真理又被看作动人的电影情节,那么,任何人都很难逃脱其影响,或者摆脱与它的干系,而当你在这个故事中被赋予了某种特权地位,那么,冒险踏上挑战它的道路就会特别地困难。是否愿意冒险,是否愿意为此失去这些特权,这也是本书内容的一部分。

本书首先将阐明挑战的对象:复国主义叙事和话语。在第一章里,

本书首先指明,主流复国主义学者们将以色列理念视作现代性和启蒙运动的最终极、最成功的范式,那么,挑战这样的观点不仅仅是在对抗一个国家叙事,更重要的是,是在挑战一个有关优越和独特性的叙事范本。认清这一点将帮助我们理解挑战者们在自己的社会中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迈出多么大的步子。似乎自相矛盾的是,坚持主流观点的人们也同样深信,客观的、有经验依据的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极其重要的。为了挑战这种观点,必须证明事实与这种自我吹捧性的观点并不相符,或者干脆,证明通过对这些事实进行巧妙处理,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的叙事,比如复国主义者的叙事和巴勒斯坦人的不同叙事。

在本书中,复国主义是一种话语。这里“话语”的含义与爱德华·萨义德笔下西方对东方的呈现是一致的。在许多方面,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的解读既是东方主义的,也是殖民主义的,至少,那些挑战者们是这样表述的。<sup>①</sup> 为了呈现 1990 年代的那次挑战,在第二章里,我将讨论复国主义话语里的巴勒斯坦人。挑战者们提出,需要颠覆以色列犹太人话语中对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惯常描述。他们建议,不能将巴勒斯坦人看作施暴者,而应该将其看作受害人,在某些电影里他们甚至成了英雄人物,这样,复国主义者就变成了施暴者和罪魁祸首,难怪他们中的有些人会加以愤怒的反击,认为这样的颠覆是自我憎恨和精神错乱的表现,他们的思想在本书中也有所讨论。

前两章对复国主义叙事进行概述之后,接着在第三章,我将重点分析主流复国主义者在学术领域和电影中如何对 1948 年(国家诞生年)进行表现。我之所以选择这一年有两个原因。首先,1948 年的历史,或者说对 1948 年的历史撰写,成为后复国主义挑战中的核心议题;第二,1948 年是本书所有争论的支撑点:这一年象征了之前历史进程的终点,或者说,这一年可以解释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讨论 1948 年的事件,

---

<sup>①</sup>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纽约:年份出版社,1979年,第5—28页。另见,迪克瓦·洪尼格-帕纳斯,《虚假和平预言家:自由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之争》,纽约:海马吉特出版社,2011年。

成为有关 1948 年之前复国主义运动实质的争论的一部分,也有助于人们以对话方式探索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的圆满解决。

第四章旨在向 20 世纪早期一些批评复国主义的以色列犹太人致以敬意,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 1990 年代的后复国主义者。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中遭到了孤立和边缘化,后来,这种挑战还是逐渐成熟,并在 1990 年代汇聚成广泛的思想和文化现象。今天的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理解他们的影响。1990 时代的后复国主义挑战者们继续了那几位令人钦佩的前辈们的英勇努力和行动。这些前辈中有几位是学术界人士,也有一些记者,他们怀揣普世和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试图单枪匹马地对复古主义这一老生常谈进行批评。

那些早期的声音是最终导致了 1990 年代大辩论三大因素之一。如前所述,第二个因素是全球(尤其是西方)有关权力与知识的理论。第三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 1967 年,尤其是 1973 年以来,以色列内部引人注目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程。以色列边境上的相对平静暴露了社会内部的一些问题。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种族分裂、意识形态争论以及信教与不信教犹太人之间的鸿沟,这些都使得持异见者在沉默了多年之后再次发声,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第五章里,我叙述了这些异见的后期发展,介绍了一些以色列历史学家们的发现,这些历史学家开始挑战有关 1948 年的复国主义叙事,因此他们被称作“新历史学家”。他们不是受到有关历史撰写新理论或者知识生产新观念的激励,而是在目睹了周边环境中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后,以新的眼光阅读了档案馆里新近解密的文档,但是,大多数阅读这些档案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发现什么新证据来促使他们对复国主义版本的历史进行重写。

国际上的影响与 1990 年代的事件有着更大的关联性。第六章阐释了那些更加深刻的理论探讨,是这些理论探讨激发了人们(主要由社会学家组成)的努力,将他们的研究对象从时间上往前追溯到复国主义诞生初期,又拓展到 1950 年代,从主题上则扩展到亚非系犹太人的困境、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问题,乃至性别问题和以色列内部对大屠杀记忆的



操控等问题。和 20 世纪末全球各地的同仁们一样,这些社会学家对权力(无论是定义为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或者身份认同)如何影响科学客观的知识生产问题非常感兴趣,并和其他地区的学者一起,以崭新而令人兴奋的方式回应了这一探索。

之后,我通过审视大屠杀在建构和推销以色列理念中的作用,对后复国主义的挑战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七章聚焦以色列政府对大屠杀记忆的操控以及后复国主义者对这种做法的挑战,这一挑战触及了整个社会敏感的神经。这一挑战不仅揭露了犹太领导人并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将面临大屠杀的犹太人从欧洲解救出来,而且揭露了个别复国主义者与纳粹分子之间曾经有过同盟,这种同盟直到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的计划完全泄露后才终止。挑战者们描述了大屠杀幸存者所受到的虐待,并向读者展示,复国主义者打着这些幸存者的悲剧的旗号,兜售以色列理念,宣称这一理念是对二战中发生在欧洲犹太人身上的巨大灾难的最终解决方案。另外,挑战者们也揭示了以色列国家自诞生以来的许多所作所为,包括针对巴勒斯坦人的一些不光彩的行为,而这些行为都因为其不断唤起人们对大屠杀的记忆而具有了某种合法性。有些挑战者认为,对于大屠杀记忆的操控使得以色列社会不能充分理解那一可怕事件所带来的普遍教训,而是任由自己变成了一个固守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国家,一意恐吓整个地区的国家。

对以色列理念进行的最耐人寻味的挑战来自一些亚非系犹太学者,他们大多是社会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亚非系犹太人于 1950 年代来自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一直受到欧洲犹太人的歧视。对这种歧视的认识促使他们诉诸历史方面的研究,并在他们的逐渐得势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他们眼里,以色列理念是欧洲化的、西方化的理念,具有殖民色彩。除非改变派别,加入欧洲犹太人,否则,他们在社会中将只能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本书第八章将讨论亚非系犹太人的学术挑战以及为了亚非系犹太人的利益而进行的学术挑战。

在第六章里仅仅提及的一些问题,比如学术界有关 1948 年的辩论、亚非系犹太人、大屠杀记忆等等,并不是学术界唯一的关注点。媒体也